

契诃夫——

人品 · 创作 · 艺术

朱逸森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契诃夫

——人品·创作·艺术

朱逸森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契 诃 夫
——人品·创作·艺术
朱逸森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2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70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一版

199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本

ISBN 7-5617-1160-3/I·095 定价: 13.40 元

前 言

旨在“为人生”和为劳苦大众伸张正义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给予中国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在于它使中国人明白了“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①鲁迅先生认为，对当时正寻求着解放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发见”，其作用“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煮东西。”^②为此鲁迅先生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③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无疑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一位杰出代表。早在本世纪初，他的作品就传到中国来了。1907年，也就是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吴枬从日文将《黑衣教士》转译了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两年后，即1909年，周作人和周树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其中收入了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小说：《在庄园里》和《在流放中》，而在附在书后的“著者事略”中，译者还对契诃夫作了介绍，说他“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著戏剧数种及短篇小说百余篇，写当时反动时代人心颓丧之状，艺术精美”，还说他“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怀希望。”这段介绍文字虽简短，却勾勒出了契诃夫及其创作的一些特点。也是1909年，包天笑在《小说时报》上译出了契诃夫的《第六

①②③：鲁迅论外国文学，第25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病室》。

到了1919年,《新青年》杂志在第六卷第二号上集中刊出了一组材料,其中有周作人译的契诃夫写于1898年的短篇小说《可爱的人》(即《宝贝儿》),有列夫·托尔斯泰为这个短篇所作的“跋”,还有一篇类似“译后”的短文。而紧接在这一组材料之后的是李大钊同志执笔的一篇论文“战后之妇女问题”。在七十余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组材料,我们好似管中窥豹,看到了当年《新青年》围绕着妇女问题同封建思想进行交锋的情景。这组材料也具体地证明: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体现了新思想和新文化,因而他在中国思想界的这场交锋中成了《新青年》的“助手”。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讲的是“贤妻良母”型的妇女奥莲卡的性格和遭遇。契诃夫写道:奥莲卡有一个特点,“她总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奥莲卡的第一个丈夫是剧团经理库金。她爱库金,因而也爱上了与库金有关的一切。库金和他的剧团甚至成了奥莲卡平日谈吐的主要内容。她经常说,戏剧是人间最美妙和最重要的东西。不幸,库金逝世了。奥莲卡再嫁给木材商普斯托瓦洛夫。于是木材代替了戏剧,它成了奥莲卡言谈的主要话题。她常常一本正经地说:“运输木材的费用太昂贵,瓦西奇卡和我都为此感到气愤。”在同普斯托瓦洛夫结婚以后,奥莲卡深深觉得,生活中最为紧要 and 重大的东西是她心爱的瓦西奇卡所经营的木材。现在就连她在梦中看到的也是木材。“宝贝儿”和木材商相亲相爱地生活了六年光景。突然,普斯托瓦洛夫一病不起,“宝贝儿”不幸第二次守寡。不久后,她和兽医斯米尔宁同居。从此她说话三句不离兽医这个行当,讲的总是有关牛瘟、屠宰场、牲畜结核病等事情。她常说:“沃罗奇卡和我要给马治病。”但兽医很快随军调防,到一个离“宝贝儿”十分远的地方。从此以后奥莲卡度日如年,深感生活可怕而又苦涩,仿佛她是在嚼苦艾。后来,她把自己

的爱全部倾注到兽医前妻留下的男孩儿沙夏身上，而且她的谈话内容也随着变化。她说的话正好都是沙夏说过的，而经常挂在她嘴上的字眼儿是“老师”、“书本”和“作业”。

契诃夫在描绘奥莲卡的过程中时时流露出诙谐和幽默的情趣。《新青年》察觉了契诃夫的真实意图，因而在刊载于译文后的一篇短评中写道：契诃夫写短篇小说《可爱的人》的旨意乃在于“表示一种型式，教女人不可如此。”处身于“五四”运动高潮之中的译者要求中国妇女以奥莲卡为戒，并向她们提出了热切的希望，他在短评中写道：奥莲卡“固然可爱可怜，然而世界女人正不必如此，”“希望将来的女子……成为刚健独立、智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新青年》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译介短篇小说《可爱的人》的目的是明确的，它借助契诃夫塑造的艺术形象宣传了关于妇女问题的新思想。这在当年的读者中所起的启蒙作用是不难估计的。

为了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夫唱妇随”，《新青年》的编辑对材料作了精心的安排。它不只发表了《可爱的人》的译文，而且还同时转载了列夫·托尔斯泰为这个短篇小说所作的“跋”。托尔斯泰在“跋”中盛赞《可爱的人》的精湛艺术，称之为是一件“艺术珍品”。他说：“女性的爱在这里刻划和表现得多么细致！语言又多么精美！”但是，托尔斯泰写这篇“跋”的主要目的，是想要借助奥莲卡这个形象来宣传他的妇女观。他称赞奥莲卡体现了妇女的“美德”，赞赏她“把自己的全身心献给所爱的人，”说“她的心灵是绝妙的、神圣的。”托尔斯泰在“跋”中阐发他对妇女问题的看法，他写道：“妇女所具有的主要的、伟大的、无可替代的力量就在于爱，”“女人的事业，从她的天分上便与男子不同，所以女性完善的理想也不能与男性的理想相同。”正是由此出发，列夫·托尔斯泰才赞誉奥莲卡“永远是妇女的典范。”众所周知，世界文豪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是落后

的,错误的,他曾声称,“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是在卧室里。”^①他对奥莲卡形象所作的分析乃是这种妇女观的反映。但《新青年》的编辑和《可爱的人》的译者旗帜鲜明,他们驳斥了托尔斯泰在“跋”中表露的观点,他们说,虽然女子在生理和心理上有别于男子,但她不能因此便成为另一种人,“别有一种天职”,“我辈不能教她做专心奉事别人的物品。”

更有意思的是,《新青年》还把李大钊的论文“战后之妇女问题”紧接在《可爱的人》和“跋”的译文后面发表,进一步宣传关于妇女问题的先进主张:“妇女与男子虽然属性不同,但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有她们的地位,在生活上有她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有她们的权利,她们岂甘久在男子的脚下受践踏呢?”论文作者明确指出了女权运动的关键,他说,要彻底解决妇女问题,“一方面要联合妇人的全体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远在七十多年前刊载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一组材料,是因为它们犹如历史的见证人,具体而又生动地告诉我们:早在本世纪初,契诃夫就生活在我国人民之中了,^②而他的作品也早已参加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在不断战胜困难中前进,而新文化运动也随之迂回曲折地向前发展。契诃夫的小说和剧本愈来愈多地被介绍过来,传布开去。当年,中国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冲破重重阻力,辛勤地译介了包括契诃夫在内的俄国和苏联作家的作品,他们的工作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翻译和介绍俄

①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很有意思的是,三十五年之后,在1954年《文艺学习》第七期上,登载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宝贝儿”教育了一个落后的女同志”。

苏作家作品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纯文学的鉴赏，而是旨在启示中国的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自己处身于其间的社会现实。俄罗斯的进步文学在旧中国之所以拥有许多读者，不只是因为它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主要的倒是因为旧中国与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暴露的沙皇专制的俄国太相似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说过，“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① 鲁迅在这里把契诃夫的名字同高尔基相并列，该不是偶然的。

在译介契诃夫的小说方面，赵景深先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翻译的八卷本《柴霍甫短篇杰作集》，收入一百六十二篇短篇小说以及有关契诃夫的评传和回忆，使中国读者对小说家契诃夫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最早译契诃夫剧作的是郑振铎、耿式之和曹靖华，由于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契诃夫的五部多幕剧以及一些独幕剧都早在三十年代就为中国读者所了解。^②

鲁迅先生不仅喜欢阅读契诃夫的作品，而且亲自翻译了契诃夫的八个短篇小说，在1935年还为这几个作品的集子写了一篇“前记”，他说：“这些短篇，虽说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是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地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这就是问题。……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③ 鲁迅这

①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75—1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② 1921年，郑振铎译《海鸥》，耿式之译《伊凡诺夫》、《万尼亚叔叔》和《樱桃园》，收入由共学社编译的《俄国戏曲集》；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曹靖华译的《三姊妹》；1927年，他又译出独幕剧《蠢货》、《求婚》、《婚礼》和《纪念日》，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③ 《鲁迅论外国文学》，第106页。

番话表明，他翻译的八个契诃夫短篇小说都是可以促使读者联系现实、思考问题的，因而这些作品在当年的中国也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让我们在这里回忆一件“琐细的”与鲁迅先生翻译这八个短篇小说有关的事情。鲁迅当年曾把此事叫做文坛上的“亚细亚式的‘奇闻’”^①这件“奇闻”反映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鲁迅翻译的这八个契诃夫作品中，有一个题名为《波斯勋章》的短篇小说。他把这篇作品连同《难解的性格》和《阴谋》一起寄给了《译文》杂志，“但待到在《译文》第二期上发表出来时，《波斯勋章》不见了，”原来是遭到了国民党御侍官的禁止。鲁迅为此气愤地写道，“《波斯勋章》不过描写帝俄时代的官僚无聊的一幕^②，在那时作者的本国尚且可以发表，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倒被禁止了？——我们无从推测。只好也算作一则‘奇闻’。但自从有了书报检查以来，较有斤两的译作，能保存它的完肤的是很少的。”^③《波斯勋章》在旧中国受到禁止，正像鲁迅先生当时所说的那样，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中宣……审委会’暗杀账上的一笔”。^④这个事实又一次表明，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契诃夫的作品曾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译介过来，借以暴露当时的现实，同反动势力作斗争。

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岁月里，中国人民依然没有忘记契

① 《鲁迅论外国文学》，第110页。

② 《波斯勋章》是契诃夫写于1887年的一个短篇小说，俄文原名为《狮子和太阳》。小说中讲俄国的小城市的市长库春恩是一个勋章迷，一心想有一枚饰有“狮子和太阳”图案的波斯勋章。事有凑巧，恰好有一个波斯官员路过该小城，下榻于旅馆。市长库春恩得知后，迅即前去拜会这位波斯官员，请他吃饭、参观，可谓百般奉承，但求获得一枚波斯的“狮子和太阳”勋章。过了一年另四个月，在一个三九严寒的日子里，已经得到了波斯勋章的库春恩敞开了皮大衣，在街上来回走动，向人们炫示佩戴在他胸前的“狮子和太阳”。

③④ 《鲁迅论外国文学》，第110页。

诃夫。1939年和1944年分别纪念了契诃夫逝世三十五周年和四十周年。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还撰文纪念契诃夫逝世四十周年。在这里还必须一提的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在抗战圣地延安演出了拉夫列尼约夫的多幕话剧《破坏》，以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节。就在这个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实验话剧团排演了契诃夫的三个独幕话剧：《蠢货》、《纪念日》和《求婚》，1941年元旦在延安公演。^①如果我们注意到契诃夫在这三个独幕剧中讥嘲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庸俗、虚伪和愚蠢，注意到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也曾在抗战圣地上演，我们就不难理解延安鲁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们的选择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契诃夫的小说和剧作被更多地译过来，译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前四十余年所做的全部工作。在翻译契诃夫小说上贡献最大的是汝龙先生。从1950年到1958年，他译的二十七卷本《契诃夫小说选集》先后在平明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付梓出版。这套选集一共收入了二百二十篇小说，除此之外，还附译有契诃夫的部分日记、札记以及其他人的论述或回忆契诃夫的文字。可以说，广大中国读者主要是通过汝龙先生的译文了解小说家契诃夫的。^②在五十年代，还出版了好几个契诃夫的戏剧作品集，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林陵作序、曹靖华、丽尼、满涛、王金陵分别译的《契诃夫戏剧集》，它收入了契诃夫的

① 艾克思编纂，《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21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这里提及的拉夫列尼约夫的剧本《破坏》，即描写“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十月革命前夜的起义情况的《决裂》。

② 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文革”后陆续出版了汝龙先生依据前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的《契诃夫文集》十二卷本译的《契诃夫文集》，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九卷，全部为小说，还将陆续付梓的有小说、戏剧、散文和书信，共十六卷。这将是我国最好的一部《契诃夫文集》。

五个多幕剧和七个独幕剧，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契诃夫戏剧集》，它收入了由焦菊隐译的五个多幕剧。除了契诃夫的作品，新中国还逐译出版了《契诃夫论文学》、《契诃夫手记》、《契诃夫高尔基通信集》、《契诃夫文学书简》、《契诃夫传》、《契诃夫戏剧》、《淡淡的幽默（回忆契诃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契诃夫怎样创作》等书籍。总而言之，从五十年代起，熟悉和热爱契诃夫的中国读者越来越多，人们对契诃夫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契诃夫和中国读者的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以自己的小说和戏剧帮助建设新生活的人们战胜庸俗和克服旧思想。关于这一点茅盾在《契诃夫的时代意义》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契诃夫是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间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进而挖出这个制度在普通人的意识领域内扎下的毒根；契诃夫痛切地讽刺了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软弱动摇、孤高自赏等等劣根性，所有这一切，即在今天，也还有它的实际的教育意义。”^①巴金也肯定地谈到了契诃夫的作品对我国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还需要他那支笔，因为在我们这里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看不到他笔下出现的人物。”^②正因为开始建设新生活的中国人民需要契诃夫，所以在1954年我国热烈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广泛开展了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动：出版他的作品，上演他的剧本，放映以他的小说为蓝本拍摄的电影等等。总之，在新中国，契诃夫深入人心，可以说，好像是中国自己的作家。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现象：接触外国文学竟被认为是一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人们开始忌讳外国作家和翻译作品。时光年复一年地无情流逝，有时你不

① 《世界文学》，1960年第1期

② 《人民文学》1954年，第7期

禁会觉得,似乎许多优秀的外国作家和作品都被忘却了,契诃夫连同他的小说和戏剧也同样被忘却了。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契诃夫和他的不朽杰作早已深藏在广大中国读者的心底。他们并未忘记契诃夫,相反,他们新的生活条件下,联系着实际,重新阅读和领会契诃夫的作品。不是吗,“十年”的风风雨雨一过,在文艺园地里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契诃夫,读了《变色龙》和《套中人》,好像是契诃夫在和我们一起讥嘲着那些产生和活动于新的政治历史条件下的“变色龙”和“套中人”。

今天,社会上追逐金钱和贪图享受之风盛行一时,契诃夫似乎又受到了冷落,但是,在善良和正派的人们的心目中,《语文教师》、《醋栗》、《姚尼奇》和《未婚妻》等作品展示了潜在的前所未见的现实意义,它们激励着人们保持高尚的情操,不与平庸俗者为伍,而契诃夫的作品精湛艺术也在不断地向人们提供美的熏陶和享受。不错,现在也有人说契诃夫已经过时,例如,他们认为,“较之艺术形式更为大胆新奇的西方现代派作者们,契诃夫似乎有点陈旧过时了。人们不禁将目光越过他而朝向了西方。”^①但是,这种观点是没有生命力的,它犹如曾在我国喧嚣一时的“现代派”大合唱一样,必将被日益更新的生活所淘汰,因为它曲解了自古以来就客观存在的文艺与生活、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

事实证明,契诃夫一直生活在我们中间,一直在帮助我们同形形色色的假、恶、丑现象进行斗争,因而,我们可以预料,他还会长期地同我们在一起。

安·巴·契诃夫离开人世已经将近九十个头了。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了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笔珍

① 王璞:“契诃夫与中国”,见《俄国文学与中国》,第22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贵财富。研究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分析他的艺术创作的成就和经验，这无疑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具体工作。

数十年来，我国不少文艺工作者、学者和专家对契诃夫进行了悉心的研究，从他的遗产中吸收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剥削寄生的民主主义精神，学习了他那敏锐的观察生活的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本领和提炼语言的能力，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他的世界观的局限性，不作“买椟还珠式的学习”（茅盾语）。我们在本书中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小说家和戏剧家契诃夫进行综合地研究，探讨他的人品、创作和艺术。我们将在时代与社会生活的背景上考察作家短暂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环节，分析他的思想发展，以揭穿那些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对善恶无动于衷的”“折衷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观点的荒谬性。我们也将联系着小说家和戏剧家契诃夫的思想探索来分析他的创作发展，特别着重于展示他怎样从契洪特逐步发展成为契诃夫、而成熟了的契诃夫最终又在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上达到了怎样的思想—艺术高度。最后，我们将分析契诃夫在从事中、短篇小说和戏剧创作的廿余年的实践活动中取得的丰富经验，介绍他在艺术上的创新、特色和成就。

在分析任何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时，研究工作者所应该依据的，除了作家生活和创作于其中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外，首先当然是作家的全部文学作品和其它著述，^①但作家的书信也常能向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意义不可低估的材料，因此，我们认为，在分析小说家和戏剧家契诃夫的人品、创作和艺术时，我们固然必须依据他的丰富的创作成果，但也应该充分利用他的书信遗产。契诃夫留下

①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先生的这一番话今天依然是我们从事作家研究的指导思想。

的四千多封书信是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由于契诃夫秉性谦虚，从来不喜欢长篇大论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他的许多有意思的观点只是散见在书信之中，因此仔细地研读他的书信，对于把握他的思想发展脉络和分析他的创作及文学见解来说就更是必要的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人品	(1)
(一) “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3)
(二) “成名”后严于律己	(6)
(三) 探求“总的观念”——萨哈林之行	(14)
(四) “左拉的心灵是崇高的”	(23)
(五) 同苏沃林的相好与绝交	(25)
(六) 声援高尔基	(31)
(七) 帮助蒙难的进步学生与革命志士	(35)
(八) “为了伟大的未来”	(38)
(九) 驳艾·勃洛依德等人对契诃夫的曲解	(40)
第二章 创作	(50)
(一) 小说创作	(50)
1. 从契洪特到契诃夫	(50)
2. “生活的艺术家”	(108)
3. “一件硬板板的囚衣”	(180)
(二) 戏剧创作	(186)
1. “轻松喜剧是个好东西”	(187)
2. 《伊凡诺夫》	(190)

3. 《林妖》.....	(196)
4. 《海鸥》.....	(202)
5. 《万尼亚舅舅》.....	(215)
6. 《三姊妹》.....	(222)
7. 《樱桃园》.....	(231)

第三章 艺术..... (243)

(一) 列夫·托尔斯泰等大师对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 的高度评价.....	(243)
(二) 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	(245)
(三) 独树一帜的心理刻画.....	(252)
(四) 真挚深沉的抒情.....	(275)
(五) 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	(284)
(六) 富有哲理意义的象征.....	(295)
(七) “简练是天才的姊妹”.....	(304)

结束语..... (322)

第一章 人 品

“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①

——安·巴·契诃夫

“契诃夫的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除了无与伦比的艺术家长外，它还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美好、真诚和正派的人……”^②

——列夫·托尔斯泰

“契诃夫是一个少有的人。他善良、温柔、多思。”^③

“安东·巴甫洛维奇，您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④

“您好像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独立不羁和对什么都不顶礼膜拜的人。”^⑤

——马·高尔基

-
- ① 安·巴·契诃夫，《作品和书信三十卷集》，1974—1980年俄文版，《作品集》第17卷，第8页。下文中引用此版本时将标明：《作品集》或《书信集》以及卷次和页码。
- ② 《文学遗产》，第68卷，前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0年版，第875页。
- ③ 高尔基，《全集》（三十卷本），前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第28卷，第69页。
- ④ 同上书，第23卷，第443页。
- ⑤ 同上书，第28卷，第73页。